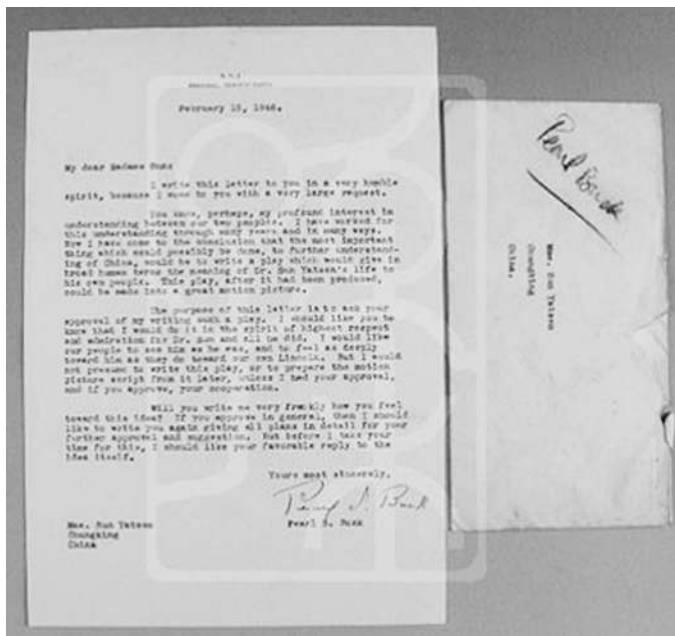


宋庆龄与三位镇江人

王荣 王抒滢



《救亡情报》创刊号

▲赛珍珠致函宋庆龄

今年是宋庆龄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全国政协办公厅在《团结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130周年》一文中说：“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宋庆龄同志紧紧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其坚定信念、崇高风范、伟大人格，深受中国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敬仰和爱戴，永远值得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钦佩和怀念。”

本文回顾的是宋庆龄与几位有着深厚渊源的镇江籍人士的交往。

与马相伯共办《救亡情报》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申城掀起救亡热潮，各界群众纷纷成立救国会。1936年1月28日，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和学生救国会等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组成执行委员会，创办《救亡情报》，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支持各界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5月31日至6月1日，来自各省市救亡团体的70余名代表在沪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马相伯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并决定将《救亡情报》作为该会的机关报。由于马相伯的社会地位和救国热情，被公认为救国会领袖，一切通电、文件均由他领衔。

1936年5月6日，《救亡情报》创刊号出版发行。报头“救亡情报”由马相伯题写，时年97岁，故落款为“九七老”。

1936年11月23日，发生了“七君子事件”，马相伯在南京闻讯后异常气愤，立即投身到了营救“七君子”的活动中。他首先致书冯玉祥将军，“老夫愿以头颅作保，疾呼‘爱国无罪’”。

1936年11月29日，《救亡情报》在第一版整版刊发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和《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对国民党政府强加在“七君子”头上的所谓“罪嫌”和逮捕理由，逐条进行了批驳，并再次呼吁：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政府如真欲取信于人民，明示抗敌之决心，则首先对民众自动组织的救国团体即应开放，还在其他而允许民众以最大限度之救国自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

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936年12月18日，《救亡情报》出版西安事变号外。内容主要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会马相伯等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和《全救会为西安事变致电国府及国府》。在报纸的左下角，还刊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马相伯、何香凝、宋庆龄3人于12月16日的亲笔签名。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九一八事变后，他坚持主张团结抗日，被誉为爱国老人。1939年，中共中央致电誉其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国民政府贺文誉其为“民族之英，国家之瑞”。他于1939年11月在越南病逝。1952年从越南谅山迎回灵柩，安葬于上海愚公陵园。1984年4月6日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

婉拒赛珍珠

1896年，美国作家和女权活动家赛珍珠随父母侨居江苏镇江。镇江是赛珍珠童年、少年、青年的生活地，前后长达18年之久。赛珍珠把中文称为“第一语言”，将镇江称为“中国故乡”。

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宋庆龄于12月底抵达香港，把香港作为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本营。

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九龙寓所小客厅里成立，总部设在港岛西摩道21号，以“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援助、支援抗战”为宗旨。宋庆龄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中央

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印度国大党领袖贾·尼赫鲁、美国议员罗伯特·美国报业巨头克萊尔·布斯·卢斯、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德国知名人士托托马斯·曼等人担任中央委员。

1946年2月15日，美国作家珀尔·巴克(赛珍珠)致信宋庆龄。信的全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末尾有珀尔·巴克的签名，信纸上标有“宾夕法尼亚 凯西”字样。

这封信件的主要内容是赛珍珠请求宋庆龄允许她写一部关于孙中山的电影剧本，并据此拍一部电影，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这封赛珍珠致宋庆龄的信，一方面记录了宋庆龄和赛珍珠曾经有过的交往，另一方面信中所流露的赛珍珠对孙中山的崇敬及对宣传孙中山的热情，也印证了她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特别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

宋庆龄当时是如何回复赛珍珠的，暂无从查考。1956年全国筹备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宋庆龄协助了部分筹备工作。纪念活动结束后，宋庆龄于1956年11月27日致函周恩来建议道：

从这次筹备纪念的工作中，可以看到中山先生的坚毅无私的革命精神构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动人的事迹。我个人的想法是：可以把这种事迹编成一个故事作为国内外的宣传。我建议用这个题目编制一部电影，挑选最优秀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等进行这项工作，使这部电影有吸引力而对教育青年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其积极性……10年前，当我在重庆的时候，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来信征求我的同

意，编写一部关于中山先生一生的电影。那时我复信说中国内战未息，还须等待机会。

由此推断，当时宋庆龄的回复是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婉拒了赛珍珠的请求。虽说宋庆龄拒绝了赛珍珠，但对编写一个剧本宣传孙中山电影的想法，宋庆龄与赛珍珠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才会有10年后宋庆龄对周恩来的提议。

题写“伯先公园”

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内部总长赵声(字伯先)，在1911年的广州起义中任起义统筹部副部长，起义失败后避居香港。不久急病发作，1911年5月18日在香港逝世。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其为上将军。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说：“大江上下，夙愿多豪杰之士，十稔以还，烈士奋起，或潜谋狙击，或合举义旗，取义成仁，项背相望，如赵君声，吴君樵，熊君成基，倪君映典，尤其卓然著才者也。”

1924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赵伯先，由同盟会会员冷遵倡议筹建，辟云台山为伯先公园。1925年，造园专家陈植主持伯先公园设计工作。1926年2月开工建设，1931年6月竣工，历时5年，占地110余亩，耗资20万元(银圆)。初名伯先烈士公园、赵声公园，后更名为伯先公园。1931年6月2日，举行伯先公园落成典礼。1937年12月，镇江沦陷，伯先公园内的赵声铜像、碑文被毁。1945年重新铸立赵声铜像。“文革”中，伯先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名“伯先公园”。

1979年8月，宋庆龄题写“伯先公园”，勒石嵌于公园大门右侧。(作者单位：镇江冷遵纪念馆，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

东大学教职一事也有记录。1932年7月4日，黄际遇于晚饭后往闻一多处喝茶聊天，游国恩在座，梁实秋后至。黄际遇称：“一多志笃学高，去世绝瓦兹兹奇话，势不得不他就矣。”所谓“势不得不他就矣”，当指闻一多向校方提出辞职一事。1932年7月21日晚，黄际遇访问一多，得知其“已兑清华之约”，不禁感叹“聚首经年，分襟有日，况在同心之友，仓惶莫如”。1932年10月16日，黄际遇挈儿辈驾车德平路访菊，见到含苞待放之菊，“回念曩年，金菊一多，共载交簪，兴豪而雅。今虽未开之菊，来日方长，而已别之朋，前尘难割。生即多感，时不再来”。

闻一多离开山东大学后，仍然与青岛故友们保持着联系。黄际遇素有购书、藏书之好，1932年10月31日，闻一多便专门介绍北平宏远堂专搜集清代文集的刘书贾来见。1933年10月4日，闻一多向不函报友朋，黄际遇与游国恩昨天刚开玩笑说“有子五人，不一而足；读书万卷，虽多奚为”，今日便收到闻一多寄来的《岑嘉州年谱》一文，又戏题其后曰“给自己难过，替古人担忧”二语，黄际遇即写报之。

1935年10月21日，黄际遇收到闻一多自清华大学寄示的论文《诗新台鸿字》与《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读后称此为“治《毛诗》新法也”。郭沫若赞闻一多“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贻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闻一多全集·序言》)，黄际遇于日记中也曾说“念吾党卓尔可造者，闻一多其选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孤子之感，不克自胜”，当有异曲同工之妙。

较为遗憾的是，任初先生的日记始作于1932年6月初，而此时已临近闻一多离开青岛之际。

鲁迅校勘《瘞鹤铭》

周惠斌

鲁迅对“大字之祖”《瘞鹤铭》素有浓厚兴趣。梁天监十三年(514年)，《瘞鹤铭》镌刻于镇江焦山石壁之上，结字错落疏宕，字体张扬流畅，笔势雄健飞舞，笔法灵秀洒脱，为历代众多书法家称颂。后来因雷吉崩落于长江之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得残片5块。

1914年，鲁迅购得《瘞鹤铭》的影印本，他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至有正书局买《黄石斋夫人手书经》一册，三角；《明拓汉隶四种》《刘熊碑》《黄初修孔子庙碑》《匄斋藏瘞鹤铭》《水前拓本瘞鹤铭》各一册，共价二元五角五分。”4年后的1918年2月3日，鲁迅又从琉璃厂购买《瘞鹤铭》拓片，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后同二弟往留黎厂买《瘞鹤铭》一枚，泉五元。”

鲁迅校勘《瘞鹤铭》极其认真。首先是厘清它的尺寸大小、字体形态、石刻布局和所在位置。其次是抄录全文，细加描摹，将拓片上的铭文用大字标出，同时参考集藏的碑帖拓片，多方

互勘，将已知的缺字脱文，以小一号的字体一一补录并标出，使之笔意相连。最后根据字的大小、位置，重新排列《瘞鹤铭》的文字顺序，指出权威著作《金石萃编》所记载的“高八尺，广七尺四寸，十三行，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说法有误，正确的应该是“刻高约一丈三尺，广八尺。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

在深入考证和缜密研究后，鲁迅认为，清康熙时期，焦山《瘞鹤铭》在复原时，仅仅依据《金石萃编》中记载的布局、尺寸等，来确定它的具体空间位置，并不准确也不够严谨。因为，根据《瘞鹤铭》传世拓片上实际的字形大小和行距，若是“铭高八尺内”，则每行只能写十八九个字而已，根本无法容纳“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可见鲁迅校勘《瘞鹤铭》的精准。而尤令人称道的是，鲁迅抄录、描摹《瘞鹤铭》时，选用了长25厘米、宽32厘米的竹纸，字迹工整；若将脱漏的文字填入鲁迅所留出的空缺之内，可以说是丝丝合扣，让人叹服。

郭沫若智斗特务

周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上海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候，身在江西南昌的郭沫若满腔义愤，挥笔写出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深刻揭露了蒋介石的三大背叛罪名，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和背叛革命。蒋介石看到文章后很得咬牙切齿，下令“通缉”郭沫若，并禁止出版他的所有文章。

从此，凡是作者或译者是郭沫若的书刊，一律被禁止。面对这种局面，郭沫若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他开始用“麦克斯”作为笔名继续发表文章。但由于“麦克斯”知名度不高，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笔名就是郭沫若。例如，他的第一部自传《我的童年》，一出版后便被查禁。郭沫若就把它易名为《我的幼年》。《我的幼

年》遭查禁后，又改为《幼年时代》……总之，虽屡遭新闻检查机构特务的查禁，但作品经改名后已出版多次。如此反复，特务们都有点麻木了。

为了迷惑特务们，郭沫若又采取了更巧妙的斗争方式。比如他的代表作《反正前后》刚出版就遭到了查禁，结果两个月后改名为《划时代的转变》再次出版。同时，出版者还专门在扉页上加了一段文字说明，公开声明此书已经“呈部审定，其内容并无过激，核准发行，尚希读者注意及之”。这段郑重其事的声明很容易让人感觉《划时代的转变》应是《反正前后》的删改本了。但是，这两本书除书名不同外，文章一个字也没有改动过，特务们被彻底弄糊涂了，《划时代的转变》发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戈公振洞察敌奸

周二中

戈公振是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学开拓者。

1928年8月，戈公振从旧金山到达日本，考察横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等地的新闻事业。当参观到京都大正纪念博览会“满蒙馆”、福冈的“元寇纪念馆”时，看到日本当局每年都用当年忽必烈十万东征军葬身大海的历史，以电影、展览、教科书、纪念会等形式大肆宣传，搞得轰轰烈烈。

作为新闻记者，戈公振马上感觉到日本的宣传很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煽动民众的反华情绪，从而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大做文章。戈公振于是一针见血地写道：“过去这么久的事情，他们却铺张扬厉地纪念

着，借超度亡魂的名义，鼓动人民的敌忾心。”戈公振敏锐地察觉到日军企图侵略我国东北的野心，他当即发回《旅日杂感》《旅日杂感》等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以唤起国内的警惕。

戈公振呼吁：“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壁垒森严，消除内争，把势力集中起来对付他们。”不仅如此，1932年初，戈公振还以记者身份参加国联调查团到上海和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真相。他三进沈阳城，到九一八发生地北大营调查第一手材料，曾遭日伪警宪的逮捕。后经营救，得以获释。

1935年10月15日戈公振抵达上海。不久，因身体不适宜住院，初诊为盲肠炎，于10月22日下午2时病情恶化，不幸去世，享年45岁。

《黄际遇日记》中的闻一多

林才伟

在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的东北角，有一座德式建筑风格的二层洋楼。楼前立有闻一多先生的塑像，并镌有其学生臧克家撰写的碑文。这便是国立青岛大学第八宿舍楼。

1932年前后，黄际遇先生(字任初)“未携眷，独居第八宿舍楼上”，闻一多先生(字友三)“后来送家眷还乡，也迁入第八宿舍，住楼下”(梁实秋《记黄际遇先生》)。

是时，黄际遇任国立青岛大学理学院院长、数学系主任，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二人除了在校务工作上往来外，私下交游更密。同游者有李超、梁实秋、杨振声、赵大侗、黄仲诚、吴子春等，“觥筹交错，庄谐横生，邻有倩歌飞笺应召，虽不藏钩赌饮，而一曲冷然，烦襟顿洗，信友朋之欢娱，尤旅羁之慰藉也。同游者洗盏更酌，皆曰：‘久无此乐矣。’”

黄际遇不仅专研数理，更是博通文史，留日期间，还与黄侃一同师事章太炎治骈文、《说文》之学。

1932年7月7日，闻一多、游泽丞来谈，黄际遇“为述清代骈文家堪与容甫(汪中)、稚存(洪亮吉)、莼客(李慈铭)伯仲者，有孔广森、杨芳灿、吴锡麒、陈维崧、曾熈、乐钧、刘锡绾、张惠

仙”的雅号最初来源于闻一多先生在酒桌上的“狂言”，那次闻一多酒兴正酣，顾座上共有8人，一时灵感，遂曰：“我们是酒中八仙！”这8个人是：闻一多、黄际遇、杨振声、赵畴、陈命凡、刘康甫、方令孺和梁实秋。梁实秋说：“即称为仙，应有仙趣，我们只是沉酒曲案的凡人，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大都端起酒杯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于乱而已。”闻一多“酒量不大，而兴致高。常对人吟叹‘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黄际遇日记中不乏众人好饮之记录。1932年6月18日，黄际遇晚应闻一多、杜毅伯之招，饮于顺兴楼，同席者有陈季超、梁实秋、杨振声、赵大侗、黄仲诚、吴子春等，“觥筹交错，庄谐横生，邻有倩歌飞笺应召，虽不藏钩赌饮，而一曲冷然，烦襟顿洗，信友朋之欢娱，尤旅羁之慰藉也。同游者洗盏更酌，皆曰：‘久无此乐矣。’”

黄际遇不仅专研数理，更是博通文史，留日期间，还与黄侃一同师事章太炎治骈文、《说文》之学。

1932年7月17日夜，黄际遇访问一多于大学路，游国恩陪同，闻李调元光绪七年论雅斋刊本《楚庵赋话》，有乾隆四十三年李氏自序，即付还闻一多。

言、胡天游、彭兆荪、王艺孙、毛奇龄、李兆洛、孙渊如、包世臣等，《四部丛刊》多存其集，尚有《骈文类苑》可考云”。谈论兴发，黄际遇专门拿出“余久不以此示人”的《爰旌目录》及《祭雷化云》以观。

1932年7月4日，闻一多看完《石遗诗话》一部以还黄际遇。黄际遇见闻一多新得《青草堂集》，说是赵国华作，黎选《续古文辞类纂》，直隶只此一人，故名不显于世。闻一多曾在游历泰山时见到赵国华之孙赵显之，因此他泰然所见赵国华，赵显之狂喜，将此书赠予闻一多。黄际遇又闻称述其先祖有曰：“先生眇一目，应童子试，与某生文前属对，谓先生曰：‘一眼茫茫竟在诸君以上。’应曰：‘众星朗朗当明月之光。’遂擢先生第一。”闻一多又说：“先生为文，奇恣闳丽，定盒而后一人而已。”“然集中曾无只语及定意，殆不可解”，次日，黄际遇自晨起后便“专悻一多处假《青草堂全集》读之”，称“一多之言盖信，为礼记数则而归之”。

1932年7月17日夜，黄际遇访问一多于大学路，游国恩陪同，闻李调元光绪七年论雅斋刊本《楚庵赋话》，有乾隆四十三年李氏自序，即付还闻一多。

《黄际遇日记》中对闻一多辞去山